

历史的选择

Lishidejuece

—— 长征重要会议

主编 李世明 田修思



国防大学出版社

历史的决策

——长征重要会议

主 编 李世明 田修思
副主编 刘长银 柴绍良

国防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决策——长征重要会议/李世明, 田修思主编.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626 - 1964 - 2

I. ①历… II. ①李…②田… III. ①中共中央—会议文献—1934 ~ 1936
IV. ①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0673 号

历史的决策——长征重要会议

李世明 田修思 主编

出版发行: 国防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 编: 100091

电 话: (010) 66772856

责任编辑: 吴辅佐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0 册

定 价: 55.00 元 (平) 75.00 元 (精)

党和红军的智慧之光

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其中最重要的有 32 次。从这些会议中，我们不仅能看到长征历程的艰险、敌人处心积虑的图谋、党内争论的激烈，同时也能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能力，闪烁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历史证明，正是这一系列重要会议作出的重大决策，将红军长征引向了胜利。

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逐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湘江战役后，红军的处境极端危险。这时，敌人已判明红军的行动意图，并在通往湘西的前进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准备在那里围歼红军主力。为了解决红军往哪里去的问题，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通道军事紧急会议，会上请回被撤职已久的毛泽东参加会议。这是毛泽东自 1932 年 10 月宁都会议后，第一次参加红军的军事决策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力主放弃原定的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顾李德的反对，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最终决定红军向贵州前进。1934 年 12 月 18 日，党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顽固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主张。李德因病未参加会议，托人在会上转达了与博古相同的意见。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建议中央放弃北上原定计划，向遵义地区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就此作出决议。会后，周恩来将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暴跳如雷，大发脾气。一向温文尔



雅的周恩来毫不妥协，拍案而起，震得桌上的马灯都熄灭了。红军西进到施秉、黄平、瓮安等地后，博古、李德又提出不过乌江，在南岸转战，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接着，在12月31日夜召开的猴场政治局会议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意见，重申黎平会议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三次重要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作出的重大决策挽救了中央红军，同时也提高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威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会上，周恩来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磋商的意见，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毛泽东驳斥了博古为失败作的辩解。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会议决定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从此毛泽东进入了党和红军的决策领导层。红军一渡赤水进入扎西后，党中央于2月5日至10日凌晨，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对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党中央在遵义、鸭溪地区决定成立红军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这标志着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又前进了一步。

遵义战役，是红军自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蒋介石认为这是国民党军对红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亲自飞抵重庆，部署对中央红军的新围攻。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求战情绪高涨，林彪、聂荣臻提出要攻打打鼓新场。3月10日，张闻天在遵义县枫香镇的

苟坝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绝大部分人同意打打鼓新场。毛泽东考虑到打鼓新场西面是孙渡2个旅，西北是周浑元2个师，东南是吴奇伟3个师，东北是郭勋祺川军模范师，距离都很近。如果开战，就有被合围的危险。他坚持打鲁班场，因为那里只有两个师，松动一点，打好了油水大，打不好有路可走。并且说，如果硬要打打鼓新场，他的前敌司令部政委就不当了。于是，张闻天主持搞民主表决，结果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表决掉了，决定攻打打鼓新场。由周恩来起草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11日晨下达。毛泽东连夜打着马灯，沿着一条田埂小路，翻过一个小坡，走了5里路到周恩来住处商量。他们又找了朱德商量。周恩来、朱德被毛泽东说服了。天亮以后，周恩来提议继续召开会议，统一了认识，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改打鲁班场。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过去的“三人团”主观武断，弄得中央政治局啥也不知道不好。现在20多人的会议讨论军事行动，争论不休，解决不了问题，又贻误战机，还是成立几个人的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对中央政治局负责。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政治局会议，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三人小组又称新“三人团”。苟坝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红军渡过金沙江，实现了遵义会议北渡长江的战略决定，跳出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有的仗也没打好，出现一些埋怨情绪，这种情绪在中央和红军领导层也有所反映。林彪表现得最为活跃。他一直埋怨说，我们尽走“弓背路”，要求走“弓弦”，走捷径。在会理休整期间，他给彭德怀打电话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



我们跟你走。”他给中央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理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5月12日，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严厉批评林彪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的表现。毛泽东说，我们几渡赤水，调动敌人，跑路虽苦，但终于胜利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离最近的滇军也有两三天路程，一过江我们同四方面军会合的日子便指日可待了。可是现在却有人对穿插、迂回的作战方针，多跑一些路，发牢骚，甚至给中央写信，要求改换领导，这是动摇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行为。他对林彪进行了严厉批评：“你懂得什么？你不过是个娃娃！”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8月19日，党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会上鉴于周恩来病重，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标志着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领导权的确立。

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之所以能够使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和不断巩固，就在于他具有非凡的政治勇气和远见卓识，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正确主张；就在于他始终心系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即使在受到排斥和不理解的情况下仍坚定信念、毫不动摇；就在于党和红军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不断理解和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时，更加注重树立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威信。实践证明，党和红军选择了毛泽东，是历史的必然，是全党全军的意志。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正确指挥，红军长征是什么结局，难以想象。

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制定和完善了红军正确的战略方针

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也是围绕军事指导方针展开的正确

军事路线与错误军事路线之间的较量，最终真理战胜了谬误、正确战胜了错误，确保了红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中央决定实施战略转移。当时毛泽东受到“左”倾错误领导人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排斥，险些被留在苏区，周恩来力排众议说服博古等人才让他跟着红军长征。尚未从恶性疟疾中康复的毛泽东躺在中央纵队的担架上，与因伤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骑马行动的张闻天一同行军，毛泽东与他俩经常探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教训和党、红军的前途命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得到他们认同和重视。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一度陷入险境，红军向何处去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党中央在通道城召开的临时紧急会议，采纳毛泽东转兵贵州的意见。接着召开的黎平会议，采纳毛泽东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正确主张，再次否定博古、李德坚持的原定计划，并通过《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党中央在猴场会议上，再次重申黎平会议形成的决定，并在会议通过的决定中指出，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这三次会议实事求是地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避免了可能被消灭的危险。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会议决定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经贵州省习水县土城至四川省泸州地区一线，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935年1月24日，按照计划，红一军团占领土城。至27日，除红九军团外，中央红军主力陆续抵达。进军途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沿途察看地形，认为土城以东的青杠坡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可以打伏击，围歼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祺师。毛泽东得知尾随我渡江的敌人约有4个团后，认为集中红三、五两个军团，有绝对优势。经红军总部决定，1月28日清晨



5时，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亲自指挥下，青杠坡战斗（土城）打响了。当红三、五军团在青杠坡阻击郭勋祺部时，敌人已占领了青杠坡东面的一些制高点，红军反复冲杀肉搏，始终未能突破敌人火力网封锁的一个葫芦形隘口。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青杠坡村外的小山顶上建立了指挥所，几乎可以360度地环视战场。他们看到，前面是强敌猛攻，后面是赤水河阻挡，红军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局势，险情莫测。危急关头，毛泽东命令去打赤水县城、元厚的红一军团立即返回增援。朱德提出上前线指挥，毛泽东、周恩来没答应。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子弹打不中我朱德！”说完带领陈赓的干部团急赴前线。干部团如猛虎下山，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敌人。下午2点过后，红一军团第2师回援，与干部团协同作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阵地。后来，从俘虏的口中得知，川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跟红军参战兵力差不多。党中央当即召开由政治局和军委主要成员参加的紧急会议，这是迄今所知红军在战斗中召开的唯一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为了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师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与会者同意毛泽东改“北渡”为“西进”的意见。1月29日，各路纵队紧张有序地渡过了赤水河，炸掉了浮桥，甩开了尾追之敌。四渡赤水从此开始。

红军一渡赤水进入扎西后，中央政治局在扎西连续召开3次会议。2月5日，党中央及中革军委进驻水田寨，在花房子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常委分工，明确职责和任务，还讨论了中央红军目前的战略行动方针。2月6日，中央机关随中央纵队从水田寨进驻石坎子，党中央在大河滩庄子上召开了为期3天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讨论决定中央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重

新确立实事求是、敌变我变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等。2月9日，中央红军各军团相继完成在扎西地域的集结，党中央进驻扎西，总部驻扎西镇“江西会馆”，当日至10日凌晨，党中央在江西会馆的戏楼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十二字方针，决定中央红军重入贵州，二渡赤水，循原路反攻遵义，出其不意地杀回马枪；中央红军进行精简整编；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扎西会议确定的红军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军胜利实施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等重大军事行动后，会理会议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935年6月18日，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举行会师大会。为了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党中央于26日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川陕甘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尚好，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敌人力量薄弱，而“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的实际，中央政治局于28日正式作出关于两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这一决定指明了红军前进的正确方向，对中国革命和红军的胜利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党中央于8月4日至6日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8月



20日，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补充和完善了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决议，使红军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之所以能够制定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就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为党和红军的前途作出正确抉择；就在于我们党能够审时度势，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军事战略方针，引领红军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在于我们党和红军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确定的正确战略方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确保了党中央战略意图的圆满实现。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正确战略方针的指引，红军长征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为党和红军战胜分裂、巩固团结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军三大主力之所以能够胜利会师，从党和红军内部来讲，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可以说，不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便没有整个红军长征的胜利，便没有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鉴于当时的形势，主张继续北上，而张国焘却错误地坚持占领青海、新疆，或者南下川、康边的方针。随后的两河口会议，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张国焘虽表示了同意，但当先头部队于1935年7月16日抵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时，却借口目前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并提出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公然向党争权。他还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故意拖延四方面军的行动。对此，党中央虽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维护

党和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儿盖集中。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在毛儿盖附近的红一方面军红1、3军，红四方面军红4、30军，军委纵队大部，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红9、31、33军，红一方面军红5、32军及军委纵队一部，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为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党中央决定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进行了两项议程：一是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会上，张闻天首先作了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决议草案的报告。在讨论这一报告即第一项议程时，毛泽东首先发言，就决议草案作了补充说明。他着重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与会同志分别作了发言，不指名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在会上极力为其错误进行辩解，认为退出川陕根据地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联邦政府都是正确的。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的讨论作结论时说：对决议大家意见无大分歧，同志们也都是一致的，这是红一、四方面军胜利前进的保障。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提出了一个吸收红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名单。张国焘打着“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提出增加四方面军9人进中央政治局，想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成为政治局的多数（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共8人）。会议否决了张国焘的意见，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这次会



议，对于加强两个方面军的统一领导和团结，坚定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必胜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暴露出张国焘的个人野心。

此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毛儿盖会议，再次重申北上方针，并多次致电张国焘，陈述南下无出路，催其北上，但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仍坚持南下，甚至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当即紧急磋商，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1、3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单独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可以看出，张国焘一再对抗中央，错误一再发展，党中央的态度表现出极大的克制，从顾全大局授以红军总政委，到一再致电耐心说服，再到悄然撤出脱离险境，其中既有维护红军团结、避免冲突、共同北上的考虑，也有团结教育张国焘本人之意。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其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此，党中央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其另立之“中央”。张国焘率部南下后，于1935年10月、11月间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中取得击溃川军6个旅的胜利，又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中取得歼灭川军1.5万人的胜利，但自己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当国民党增调重兵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张国焘被迫率部西撤，越过大雪山，于4月上旬撤到主要是藏民居住的甘孜、炉霍地区。红军虽英勇奋战，但伤亡很大，到达甘孜后，部队从8万人锐减到4万余

人。这时党中央仍从陕北不断把各方面情况电告红四方面军，要他们继续北上。这样，再加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肯定等因素，张国焘被迫于6月6日宣布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7月2日，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两个方面军共同挥师北上，并于10月下旬在甘肃静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我们党召开的重要会议之所以能够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为，就在于毛泽东和党中央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党的团结路线，以博大的胸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坚决地维护党的领导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就在于毛泽东和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北上方针，并千方百计地把北上方针变为全军的实际行动；就在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坚持从大局出发，始终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表现出斗争的坚定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从而使党始终掌握与张国焘斗争的主动权，有效地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试想，如果当时党中央放弃北上方针而屈从于张国焘的南下路线，10万红军必将全部陷入南下的绝境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

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实践

一部中国革命史包括长征史在内，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今天，学习研究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实践中汲取政治智慧和精神力量，对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切实认清确立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长征途中，革命之所以在关键时刻转危为安，最根本的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广大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地“跟着走”，从此中国革命就开始从胜利走向胜利。回望中国共产党90年以来的奋斗历史，正如长征途中，党和红军选择了毛泽东一样，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与党同心同德。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长征的胜利，是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胜利。长征中，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确立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始终坚持依靠自身力量，始终敢于坚持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从而使中国革命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航行，也为全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树立了光辉典范。当前，党和国家各项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要适应新的形势任务，就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不迷信、不盲从，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大兴密切联系群众、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切实端正工作指导思想，改进思想作风，真抓实干，扎实工作，始终保持开拓创新的精神动力，努力创造新的业绩，不负党和

人民的重托。

必须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根本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是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党内团结、增强党的活力的重要保证，只有坚持和用好这种科学的组织原则，才能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正确解决党内矛盾，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紧密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步调一致的坚强战斗集体，才能使党的团结和统一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红军被迫长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主集中制缺失，正确意见受到压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得不到及时制止和纠正，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中，正是由于恢复和坚持了民主集中制，保证了党中央决策的科学性，独立自主解决了长期困扰红军的组织领导、军事指挥等重大问题，最终促成长征胜利。历史告诫我们，民主集中制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要切实从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充分认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性，自觉做民主集中制的坚定信仰者、忠诚拥护者、自觉实践者，带头学习掌握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要求，严格落实党内生活和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坚持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坚决防止和克服个人或少数人专断，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政令军令畅通。

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长征的胜利，关键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团以上单位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坚持支部建在连上”等根本原则和制度，确保党始终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新形势下，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更加繁重，迫切要求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政治风浪和严峻考验，都必须始终牢记“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始终不渝地高举党的旗帜，坚持不懈地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确保部队建设正确方向，始终保持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